

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儒家的反动思想阻碍和破坏我国 解剖生理学的发展

上海生理研究所理论学习小组

研究儒法斗争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所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初步研究了儒法斗争与医学生理学的关系，使我们看到儒家思想对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展是起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的。

儒家“礼教”直接阻碍了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展

儒家代表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和政治势力，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的需要，炮制了一套反动礼教，什么“仁义”、“孝悌”、男尊女卑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把他们所鼓吹的“仁义”说教加到医生头上，说什么“医者仁术也”，解剖尸体被认为是“不仁”，是绝对不许可的。儒家的所谓孝是“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礼记》卷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卷一）就是说父母完整地生了你，那你也要完整地死去以归还之，即使身上的一根头发、一块皮肤也不应受到损伤。不仅如此，按儒家礼教的规定，人死了还要按死者的等级身份“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谁若是违反了这些说教，就是“不仁”、“不孝”，就是“大逆不道”，甚至还要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例如，南北朝时有个叫刘赐的人，因死前曾吐虫二十余条，所以他的家属便遵照遗嘱为他进行了尸体解剖。后来，这件事被统治者知道了，他们竟把死者的妻子和儿子分别加上“不道”和“不孝”的罪名而杀害了。从这个血的事例不难看出，儒家礼教给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多么严重！

儒家宣扬“仁义”、“孝”完全是为着他们的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当历代打着孔孟旗号的统治者们要镇压农民起义时，就收起“全而生之”、“全而归之”的那套假面具，露出凶残毒辣的真象。他们对农民起义领袖和法家代表人物残酷镇压，往往采取车裂、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等酷刑，并把尸体割裂示众，这就是儒家的礼治！

另外，由于儒家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剥夺了广大妇女参加医学实践的权利，使男子不便于研究妇女生理特征，以致对妇女的解剖生理特点的研究，更是落后。例如，宋朝有个法医学家的叫宋慈，对验尸很有研究，无论是吊死、淹死、烧死，是自杀还是被杀，他都有详细的观察，并在1247年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法医书《宋提刑洗冤集录》。但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允许进行尸体解剖，所以这本书中没有一处提到法医检验时要进行必要的尸体解剖观察，书中记载的关于妇女骨骼数就有很多错误。例如书

中写道：“男子骨白，妇人骨黑”；脑颅“男子八片，妇人只六片”；“左右肋骨男子各十二条，妇人各十四条”。（宋慈：《宋提刑洗冤集录》）男女骨骼数本来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记载当然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被以后明清历代都定为法医的经典，规定为郡太守、县令老爷们必读的一本书。但是在这几百年中多次刻印，都没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予以修改，而作为骨骼解剖书广泛流传。

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严重束缚了医学生理学的发展

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的需要，竭力炮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也鼓吹“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人的寿命是早已由天决定的，人们只能修养自己的身心来等待天命。孔老二本人就是个信巫不信医的家伙，他生了病，人家给他开了药，他不相信，连尝也不敢去尝一下。他只相信做祷告，去乞求天命。天命论从根本上阻碍了医学的发展。

例如清代有个儒医叫徐大椿，他根据天命论，炮制了一个“医者误人无罪论”（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就是说医生把病人错医致死也是无罪的。他的主要论点就是如果医生开错药方把病人治死了，因为医生不是存心谋害的，而是因为病人命里注定是要死的，医生只是按照命里所定造成其死罢了，所以他认为杀人的罪名是加不到医生头上的。结论是出了医疗事故，是由于病人命里注定，医生可以一推了之。这是儒医们炮制的典型谬论之一。

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也直接渗透到解剖生理学，给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展带来极恶劣的影响。例如董仲舒为了证明“三纲五常”之类的理论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炮制了“天人合一”的理论，称之为“人副天数”（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就是说人体是天的副本，人体上每一部分都是按照天地的构造形成的。他胡吹什么人有四肢，是因为天有春夏秋冬四时；人有五脏是相应于金木水火土五行；四肢共有十二个大关节，相应于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年有366天，所以人身上有366个小关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董仲舒鼓吹“人副天数”论就是这样闭着眼睛胡吹一气的。我们知道，全身骨骼一共有206块，怎么能形成366个关节？但由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董仲舒的366个关节的荒谬说教反而成了解剖学的经典，一千多年来儒家官方出版的骨骼书的第一句几乎都是这样千篇一律地跟着瞎说一气的。

由于儒家的破坏作用，致使我国珍贵的医药文献大量散失

儒家鼓吹“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统治人民的官老爷。他们竭力贬低搞科学技术的人。他们认为“医为小道”。什么叫“小道”呢？“小道乃小人之道”，“君子不为也”。就是说做医生，搞技术的都是没有出息的下等人干的事，君子是不干的。君子的“远大目标”是要做官统治人民。例如在朱熹的小学笺注里有这样一段话：“孙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而贬为技流”。孙思邈是唐朝的一个有名的进士，本来应该列入名人给予立传。但他考中进士后，不愿意做官，几代皇帝都请过，他就是不去。他认真钻研医术，热心替人民看病，写了一本著名的医药书《千金方》，孔孟之徒就认为只能被贬入“下等”的技术人员一类里去。医生的地位被贬得那么低，致使一般的医生没有资格著书立说，写出手稿也不予出版，大量医学书籍遭到儒家的摧残而失传。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焚儒家诗书时特地下令要保护医药书，汉武帝曾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西汉官方整理的医书共有医经七家计二百十六卷，经方十一家计二百七十四卷。但这

些书到东汉时只剩下《内经》、《难经》，其余都由于当权的儒家的破坏，失传了。解剖学方面的著作也是这样，如宋代杨介著的《五脏存真图》等解剖图，以后也都失传了。由于儒家的摧残和破坏，造成我国医药珍贵文献的大量散失，这也是解剖生理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家宣扬复古倒退，“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象一条精神枷锁阻碍解剖生理学的发展

儒家为了推行复辟倒退路线的需要，炮制了一套“祖述尧舜”和“礼法先王”的厚古薄今的治学方法。孔老二曾宣称他搞学问的方针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他只是忠实地颂扬“古圣先贤”，而不搞什么创新。儒家又是重内省、轻实践的鼓吹者，如孟轲从“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鼓吹“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说在他看来，作学问的办法只是求得把内心中的东西发挥出来罢了。儒家还叫嚷说，医生应该“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这样一来，就更加助长了儒家思想流毒在医学领域的传播。

儒家伪称《内经》是古圣人“黄帝”所作，并把它称为《黄帝内经》，《本草》是神农氏所作，称为《神农本草》。这些书既是“圣贤”所作，那它们便是医生的金科玉律，只能对之作些注释或考证，不能发展和创新。后来，特别是唐宋以后，注释《内经》之风大为流行，甚至在医学中所积累起来的新经验也被儒家说成是“古已有之”或省悟了《内经》内容而得来的。

在解剖生理学中，由于儒家影响，不作实际研究，迷信古人圣人的作风也极为严重。例如，汉代有个儒生叫郑康成的，在注疏《礼记》时说“肺也、心也、肝也，俱在膈上”。以后有好几百年，很多人还都闭着眼睛跟着说：“肝是长在横隔膜上面的！”

再如清朝有个医生叫沈彤，已经生长在十八世纪了。他著有《释骨》的书，是专门研究人身上骨骼的。他研究这个题目，既不从事人体解剖，又不去观察棺材中残存的人体骸骨，甚至人身上有几根肋骨也不去摸一摸。那他是怎样研究的呢？他说是根据《内经》的记载，参考了很多人的著作，并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证才得出结论的。他考证来考证去，最后胡说“男子肋骨二十四根，女子二十八根”才是出于经典，因此也是“最正确”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复古倒退路线的寄生和腐朽的本质。

然而，自然科学总是冲破各种阻力而发展起来的。回顾一下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展史，也可以看出法家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物论的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法家是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时是生气勃勃的革新者，他们主张法治，奖励“耕战”，破坏了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各种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事业（包括医学、解剖生理学在内）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正象伟大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促进农业生产，也促进医学发展。当时秦王给医生以一定的政治地位，除物质奖励外，还赐以乘车，形成秦国多良医的局面。法家政治家还采取保护和整理医药典籍的政策。《内经》就是战国时期医学的总结，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有了相当数量关于解剖生理学的专门论述。如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某些脏器的位置、大小和重量，以及“诸血皆属于心”，“心主全身血脉”等关于心血管的生理学内容等。在《难经》中已经有了关于动脉脉搏的记述，这项发现显然是为切脉法的创造提供了依据。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法家的政治路线促进了医学、解剖生理学的发展。

其次，法家为了贯彻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不断地从劳动人民所积累的丰富的自然知识

中总结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且拿起自然科学作武器,与儒家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作斗争。例如先秦法家代表荀况针对孔孟的天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他在《天论》中还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就是说衣食充足,活动得当,就能防治疾病,指出了营养和运动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有力地驳斥了“死生有命”的谬论,并且与祖国医学中重视防病的优良传统有密切关系。东汉法家王充根据当时的医学生理学知识,狠批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谬论,科学地指出生老病死是自然的代谢规律,精神不能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就象火不能离开燃烧物而独立存在一样;人死后,精气毁灭,形体腐朽而变成灰土,哪里有什么鬼神呢?这都为解剖生理学的发展从思想上开辟了道路。

法家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出发,也能注重实践。在解剖生理学上有成就的医学家都是敢于冲破孔孟反动思想的束缚,深入调查研究的。例如清代有个敢于革新的医学家叫王清任,他从自己的医学实践中深切地感到生理解剖的重要性,认识到治病要是不明白内脏的结构和功能,就象瞎子走夜路一样。他决心亲自进行研究,为了弄清人体内脏结构,他敢于冲破儒家的种种限制和非难,亲自到荒郊坟地去剖析被遗弃的病孩的尸体,去刑场观察尸体的脏器,并到处调查访问有直接经验的人,还亲自作了一些动物的比较观察,搞了四十多年,最后画了一些解剖图,写成《医林改错》一书,改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脏腑方面的不少错误,为我国医学和解剖生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家主张变革,敢于创新的精神也影响到医学、解剖生理学。如宋朝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的科学家沈括在医学上也敢于提出革新思想。他敢于对当时被奉若神明的《神农本草》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本很陈旧的书,里面的错误很多,要医生引起注意。在人体解剖学方面他也大胆革新,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前人认为人体中除咽和喉之外,还有水喉的错误。

当然,我们对法家也要进行分析。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法家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唯心史观的圈子。对于受法家思想影响的进步医学家,也要一分为二,不能停留在他们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水平上。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医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解剖生理学方面,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例如我国劳动人民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家畜阉割术,掌握了有关的生殖内分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知识,并把它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在世界上是首创。在战国时期一部医学著作《难经》中,已有了动脉脉搏的记载,并依据在一定条件下循环系统的生理表现,创造了切脉和望色的方法,用来诊断疾病。又如在公元二世纪,我国已经较好地掌握了腹部解剖,并能用口服麻醉药物进行腹部手术。这都是我国解剖生理学方面的光辉成就。

通过对上述历史资料的初步分析,我们看到法家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和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祖国医学,其中包括解剖生理学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而儒家的反动思想则是束缚和摧残医药学的桎梏,严重阻碍了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展。这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伟大教导的无比正确。我们决心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批林批孔,坚持前进,勇于革新,坚决反对因循守旧、崇洋迷外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实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好地发掘、继承祖国宝贵医学遗产,为发展我国解剖生理学事业作出贡献。